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 1927—1937

In 20 volumes

VOLUME XIV: POETRY

Preface by Ai Qing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, 1985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 第十四集 诗集

艾 青 序

编辑、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发行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 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0.25 插页 6 字数 443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18 定价：5.35 元

诗集

艾青序

序

艾 青

一

二十年代末期、三十年代初期，中国诗坛上出现两个主要的流派：“新月派”和“象征派”。

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，北京晨报《诗镌》出世。这是闻一多、徐志摩、朱湘、饶孟侃、刘梦苇、于赓虞等人主办的；然而作为《新月》月刊却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创办。

“新月派”的主将闻一多。他从五四运动前后即开始写诗，初期的诗《秋色》、《红豆》、《烂果》、《红烛》、《收回》等，采用自由体；不久却成了格律诗的狂热的提倡者，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，写了《也许》、《死水》、《静夜》、《一句话》、《飞毛腿》等诗，正如他自嘲的，是“带着脚镣跳舞”了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，闻一多的《死水》出版。如果说，《死水》，是他痛苦的绝望的诅咒；那么，他的《洗衣歌》，则是愤怒的抗议。这两首诗，表现手法虽然不同，却都是出于他爱国的一片挚诚。

第二年,因与徐志摩、梁实秋观点不同,辞去编辑职务。

“新月派”的另一个主将是徐志摩,他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。他从教会学校出来到外国学银行学。写了不少爱情诗,如《落叶小唱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起造一座桥》、《我等候你》……他喜欢在女人面前献殷勤。他的诗,常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,如他写的《沙扬娜拉》:

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
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,
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
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——
沙扬娜拉!

他的写作生涯却只有十年。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,从南京到北平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而死亡。

“新月派”的另一个成员是朱湘,这是一个充满凄苦与忧愤的诗人,对人生怀有深刻的悲观。他的诗意境优美,音调叮咛,象一串剔透玲珑的珍珠。但思想却极虚无,例如他写的《当铺》:

“美”开了一家当铺,
专收人的心,
到期人拿票去赎,
它已经关门。

早在一九二五年,他就写了一首《葬我》的诗,到了一九三三年,终于投江自尽。

“新月派”诗人陈梦家，也写了一首《葬歌》，说希望到一个“永久的国度”。他却写完了还活了二三十年。

属于“新月派”的诗人很多，活动的时间也最长，这是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一股消极的潮流。

假如说，徐志摩是以——

悄悄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悄悄的来；
我挥一挥衣袖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那么，到了陈梦家写的《雁子》，则是——

从来不问他的歌
留在那片云上？

“新月派”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
一九三一年闻一多写了一首《奇迹》之后，“新月派”已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。

和“新月派”比较接近的有《汉园集》的三个诗人：

李广田，与朋友组织书报介绍社，因介绍鲁迅、郭沫若及苏联作家而被捕，北伐军来时才释放。一九三〇年前后开始发表诗和散文。

卞之琳于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，对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的诗发生较大兴趣。

一九三〇年开始写诗。他的诗抒发了对丑恶现实的不满而

又看不见出路的苦闷,多表现忧郁的感情和哲理,诗风奇特。

何其芳于一九二九年开始发表作品,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。早期的作品表现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新诗的另一个流派是“象征派”。

象征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。所谓“象征派”,发源于上个世纪法国的波德莱尔,被留学法国的李金髮引进到中国,他的很多诗是旅居法国时写的,比法国人写的更难懂,他在白话里掺杂了中国文言,又采用自由体,造句奇特,不能让人理解。然而,有人仅仅因为难懂而喜欢它。

除李金髮外,还有一些人受“象征派”的影响,如穆木天、冯乃超、王独清等都是“创造社”的成员。王独清的诗不象是“象征派”,倒象浪漫派的诗。其他两人的诗,虽然受“象征派”的影响,也不象李金髮的难懂。

诗人于赓虞原是“新月派”的成员,受了“象征派”的影响,写的诗有一股阴森森的气氛,他有一本诗集叫《骷髅上的蔷薇》,可以看出他颓废到什么程度了。

诗人废名,介乎“新月派”与“象征派”之间,或许加上“道家”思想,写的东西象画符咒似的。他写了一首诗:《十二月十九夜》,谁也不知这个日子有什么纪念意义:

深夜一枝灯,
若高山流水,
有身外之海。
星之室是鸟林,
是花,是鱼,

是天上的梦，
海是夜的镜子。
思想是一个美人，
是家，
是日，
是月，
是灯，
是炉火，
炉火是墙上的树影，
是冬夜的声音。

所谓“象征派”，既没有一个刊物作为中心，也没有任何组织形式，只是被人们称呼的一个派别。

“新月派”与“象征派”之后出现“现代派”。所谓“现代派”，它只是以一九三二年创刊的《现代》杂志而流行的一个称呼。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人很复杂，有的原来属于“新月派”，也有左翼作家和诗人。

作为“现代派”的中心人物是戴望舒。他的诗，既有中国旧诗词的影响，也有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。他也不是专写“象征派”的诗。例如他写的《村姑》，是一首非常纯朴的爱情诗，有很浓的田园风味，却没有一点“象征派”的气味。

他的有些诗，喜欢采用日常口语，不押韵，比同一时期的诗人所写的都明快。

一九三六年，他主编《新诗》，广泛地收罗了许多诗人的作品，有意无意地撇开现实主义的诗。

二
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是中国大革命转折点。革命从高潮突然变成低潮，从上海开始进行大屠杀，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中。

中国人民的对革命的希望一下破灭了。

尽管出现上述的各种流派，而作为现实主义的倾向，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十分顽强地和它们相并行地发展着。

一九二八年“创造社”提出“革命文艺”；《新月》月刊即提出“反对革命文艺”的口号，声明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”。

同年，郭沫若在白色恐怖中写了《诗的宣言》，声称自己是忠于工人和农民的诗人。

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，他所主持的“创造社”被封。

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，这十年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统治的十年，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十年，也是中国人民大声疾呼，反对压迫、反对饥饿的十年，是中国人民唱着《松花江上》，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前进的岁月。

中国正处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情况下，是国民党实行文化“围剿”的十年。

国民党为了配合军事“围剿”，对革命的、进步的文艺、文化界实行残酷的文化“围剿”。对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，包括诗人、作家、剧作家、音乐家钉梢、暗杀、逮捕、监禁。

第一个被绞死的是李大钊。

他于一九一三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，一九一八年回国，任北京《晨钟报》主笔、北大教授，兼图书馆主任。一九一九年参

加五四运动。

他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，而且是中国新诗的提倡者，他在一九一八年后写的新诗都发表在《新青年》和《少年中国》上。

鲁迅说他的诗文是“革命史上的丰碑”。

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死于军阀张作霖之手。

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诗人殷夫是英勇的典范。一九二七年他在浦东中学从事革命工作第一次被捕，险遭杀害。

一九二八年，他成了革命文艺团体“太阳社”的成员。一九二九年他做共青团工作，组织上海丝厂罢工而第三次被捕。出狱后，他编辑《列宁青年》。

这时期，他的创作热情特别高涨，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，如：《五一歌》、《让死的死去吧！》、《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》、《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》等。

他是首先作为战士而后作为诗人的。

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官员；但他写了《别了，哥哥》，是作为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诀别的宣言。

他在《血字》里说：

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，
我也是历史的长子，
我是海燕，
我是时代的尖刺。

一九三〇年，他写了《囚窗》、《前进吧，中国！》、《奴才的悲泪》、《五一歌》、《巴尔底山的检阅》、《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》等最明显地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。

这是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,开始写诗是在一九二四年,到他牺牲的短短的五六年时间,写了将近一百多首诗,这些诗,在他生活的时代,都是不同凡响的。

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,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荒野里。

他逝世时才二十一岁,是当时被杀害的人里面最年轻的一员。

和他同时被杀害的还有:柔石、胡也频、李伟森和冯铿。

柔石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加入“晨光社”,从事新文学活动。

一九二五年,他在给友人的诗《战》中说:“呵!战!剜心也不变!砍首也不变!只愿锦绣山河,还我锦绣的面!呵战!努力冲锋,战!”

一九二九年一月,柔石和鲁迅办《朝花周刊》。

一九三〇年春,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,他是发起人。三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,他是执行委员,参加《萌芽月刊》的编辑。他成了党和鲁迅的联络人。

他死时年二十九岁。

胡也频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从事杂志编辑出版工作,曾主编《红与黑》杂志,次年与人合编《人间》月刊。他写了不少诗,出版诗集《也频诗选》。一九三〇年五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被选为执行委员,并担任工农兵通讯员委员会主席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,正准备去江西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被捕。

他死时年二十八岁。

李伟森一九二二年曾随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师范读书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同年到武汉大学读书，并做团的工作。一九二三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。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。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革命文学运动，与胡适、陈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流派进行斗争，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他死时年二十八岁。

冯铿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逃亡生活中写了不少抒情小诗及散文、小说。一九二九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她死时年二十四岁。

这五个人的被杀害是震惊世界的罪行。鲁迅说：“终于在最黑暗里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。”

鲁迅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间写了关于殷夫的诗集《孩儿塔》序说：

“这《孩儿塔》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。这是东方的微光，是林中的响箭，是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，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。一切所谓圆熟简练，静穆幽远之作，都无须来作比方，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。”

应修人于一九二三年与冯雪峰、潘漠华、汪静之三人结成“湖畔诗社”，出诗集《湖畔》、《春的歌集》，深受青年喜爱。

他于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学习，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，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，在上海因拒捕与国民党特务相搏斗，搏斗中壮烈牺牲。

冯雪峰于一九三三年年底，秘密进入江西红色根据地瑞金，一九三四年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同时国民党对许多进步书籍刊物禁止发行。

“创造社”、“太阳社”相继被封之后，一系列的刊物《拓荒者》、《北斗》、《前哨》、《萌芽》，以及后来的《春光》均被查禁。一九三六年，聂绀弩主编的《热风》月刊，第一期为“创刊号”，第二期为“终刊号”。

但是，革命的火焰是永远也扑灭不了的。

蒲风是“中国诗歌会”的发起人之一。“中国诗歌会”归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直接领导，他是“中国诗歌会”的主将。

他在一九三〇年之前，开始诗歌运动。他在东京曾参加编辑《诗歌生活》，在上海编辑《新诗歌》，在青岛办起《青岛诗歌》，在厦门主编《厦门诗歌》，在广州主编《中国诗坛》。

他到哪里，哪里就燃烧起诗歌的熊熊烈火。

一九三二年“中国诗歌会”成立，出版《新诗歌》期刊，号召诗人要“捉住现实”、“提倡诗歌朗诵”。主张“反帝反日”。这个运动在“九·一八”和“一二·八”之后。

一九三四年他出版《茫茫夜》。从他的创作可以看出两个主题：面临崩溃的火山口似的动乱农村和中国人民反帝（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）的激烈情绪。

他鲜明地把诗当作战斗武器。他在《第一颗子弹》里，喊：

.....

田野里早就诞生了火的洪流：

众多的田野的火

汇合着，

响应着；
中国的农村，
到处射出了第一颗子弹，
中国早就在燃烧着了呵！

一九三六年，他提出诗歌的“斯达哈诺夫运动”，认为诗歌应该象苏联的劳动英雄斯达哈诺夫一样的提高产量。他是这样主张，也是这样执行的。

同属“中国诗歌会”的，在日本有王亚平、任钧、胡明树、韩北屏、洪遒、林林、林焕平等入。

常任侠当时也在日本写诗。

番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，于一九三〇年开始写诗，发表于上海各报纸杂志上。

他写的《家庭》一诗，深刻地刻画了农村破产后的农民的流浪生活。

这首诗，曾得到评论家王任叔的赞扬。

在这期间，写诗比较多，质量比较高的有臧克家。他毕业于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，是闻一多的学生。也得到过王统照的帮助。

他的第一本诗集《烙印》出版于一九三四年。诗集出版后，得到评论家们的推崇。

臧克家作诗的态度一向很严肃。在形式格律方面，曾经受“新月派”的影响，但是题材上则倾向于写实。他的诗里没有爱情，也没有闲情；他认为当时的中国“需要一种沉重音节和博大调子的诗”。

他的《烙印》一出版，就受到注意。闻一多曾推许《生活》一

诗“顶真的生活的意义”。茅盾说：“他不肯粉饰现实，也不肯逃避现实……他只是用明快而劲爽的口语来写作，也不用拗口的美丽的字眼，”“运用譬喻，以暗示代替说明。”

作为一个诗人，臧克家不属于任何派别。他的诗是植根于中国的泥土里的。

他的著名诗作《老马》：

总得叫大车装个够，
他横竖不说一句话，
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，
他把头沉重地垂下！

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，
他有泪只往心里咽，
眼里飘来一道鞭影，
他抬起头来望望前面。

这是用老马来刻划中国农民的苦难。

艾青原是一个美术青年，在法国巴黎度过了“物质上贫困、精神上自由”的三年。

一九三二年初回国，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，七月被捕，丢掉了画笔，捡起了写诗的笔，在狱中三年多，写了不少诗。

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第一个诗集《大堰河》，里面收了狱中所写的一部分诗。

评论家认为艾青的诗，“多用铺陈的手法，巨幅地呈现某种

场景或情感。他较多的是用自由体，来表达沉雄浑朴的感受。他的诗，往往给人一种厚重的油画感。”

他以写于一九三三年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而引起注意。“他以满腔的挚情追怀他的保姆，满蕴着对于苦难的中国的爱心。”“他的诗有深厚的生活气息，而不流于概念与口号；他所写的愁苦，是整个民族的愁苦，浑朴苍莽。他的手法虽然受法国诗的影响，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有浓厚的中国气息。那是生活与历史与美的结合。”“也许由于时代和国家民众的灾难太深重了，反映在诗人的诗中，总带有一种浓重深沉的悲哀。”

和艾青同时入狱的有力扬，他和艾青曾先后同学——杭州西湖艺术院。他是鲁迅所支持的“一八艺社”的负责人之一。他曾两次被捕。他也在狱中写诗。如《枫》、《我在守望着》都是监狱生活的纪录。

当时比较出名的有田间，他十七岁左右到上海开始写诗，一九三五年，还不到二十岁，已出版了诗集《未明集》。这时候，他的短行诗体还未显著，每行十五字以上的长句，已显示出雄健的风格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，他回故乡，深感农民的生活艰苦，写了《中国农村的故事》。

另外有诗集《海》、《中国牧歌》，都以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风格，给人以新鲜的感觉。人们认为他的节调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。

田间的诗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战斗的情绪和呼声。

田间的诗，以一股青春的朝气、一股刚健的力、与理想主义的热情，写出中国战斗的一代的生活面。

三

朱自清在上一届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《诗集·导言》最后说：“若要强立名目，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：自由诗派，格律诗派，象征诗派。”

他指的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间的事。

我以为这样的划分是不科学的。

所谓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是从形式上划分；而象征诗派则是从内容上划分。

象征诗派既可以采用格律诗的形式，也可以采用自由诗的形式。如李金髮的“象征派”的诗，多用自由诗体。

如闻一多的《死水》，从表现手法说，是典型的“象征派”，但从它的形式说，则是典型的格律诗。

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，若要划分流派，我以为不妨从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为人生”的文学和“创造社”的“革命文学”为一条线，到“新月派”和“象征派”为另一条线，这样的划分比较清楚。

至于自由诗和格律诗，只是采用形式上的划分，这是各种流派的人都是随便使用的，谁也不会固守着某一种形式到底。

有些人曾经提出各种方案，认为诗应该象他所主张的那样写。提出这种或那种方案的人，一般地都是不实行的。

少数的人，如闻一多，自己提了，自己也做了，但是都不能坚持。

而且跟着走的人也很少。为什么写十四行诗的人总不会很多。

“为艺术而艺术”这口号本来就是虚伪的。这就象“为盖房子而盖房子”、“为做衣服而做衣服”一样是不可思议的。

没有一种艺术是以自身为目的。没有一件工艺品是为自己作为目的的。

有些人对现实不满，用艺术来安慰自己；有些人躲在艺术的迷宫里，也得有人供养他；也有的人不过是用艺术作为哀叹人生的虚无而已，只有象朱湘那样投江自尽。即使人们都自杀了，世界还是一样地存在。

为什么有人投奔革命？为什么有人愿意为国捐躯？就是彻底了解了如不牺牲自己就改变不了这个丑恶的世界。

伟大的诗人，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忠实的代言人；最高的艺术品，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思想、感情、风尚、趣味等等之最忠实的纪录。

最理想的诗，是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的深厚的、博大的思想感情的诗。

当然，诗是诗，诗不是历史。

但是，当你读完了这个十年间的诗——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间的诗之后，不是也可以看见它们的各方面的精神面貌，它们的思想、感情，它们的喜怒哀乐吗？

就把它当作历史来读，不也是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面影吗？

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，北京。